

孕育了革命的陕甘边根据地

□ 杨维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相继到达陕甘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可以说，南梁“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走武装割据道路,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西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吸取甘肃正宁县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创建革命根据地受挫的经验教训，坚持走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他们始终坚持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灵活运用“三色建军”（“红色”就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灰色”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白色”就是派共产党员深入白区或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和“狡兔三窟”等策略，先后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两当、靖远、太白等70多次兵变、武装起义，以“革命意志高于天”的精神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10月创建南梁游击队，1932年2月成立陕甘游击队，12月成立红26军，在陕甘大地建立起我们党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26军第2团南下失败和照金苏区陷落的危急时刻，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提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为革命斗争勾画了新蓝图。包家寨会议后，刘志丹率领红26军横扫敌匪，为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创造了外围条件。与此同时，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组织。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恢复成立，为创建南梁中心苏区奠定了群众和阶级基础。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的进一步成熟。此后，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数次“围剿”，以南梁为中心、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敌据点都被拔除，并成功创建庆北苏区、巩固陕甘边南区、开辟陕甘边东区，红军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经过“豆选”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快速扩大并巩固发展。鼎盛时期，根据地辖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数十万。

实行“十大政策”，使革命有了巩固的后方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

久，党政军机关随之迁至南梁堡东边的寨子湾，南梁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制定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深受根据地军民拥护和支持。

“十大政策”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统一战线等方面。在土地政策上，避免实行过火或“左”的做法，只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来的土地分给贫雇农，同时给地主富农留下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在经济政策方面，发行货币，开设集市，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称赞和响应。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兴办列宁小学，颁布禁烟、禁赌，妇女放足等条例，开启了文明的新生活。在统一战线方面，以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为目标，区别对待各方势力，能团结的团结，能中立的使其中立，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同盟者和支持者。比如，刘志丹、习仲勋始终同国民党将领杨虎城、邓宝珊等保持着联系的渠道。同时，重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建立回民支队。这些政策特色鲜明、实事求是，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繁荣了当地经济，对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习仲勋“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凝结着习仲勋的心血和智慧。刘志丹也曾对人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

南梁政府建立后实行的“十大政策”，在陕甘边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使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有

了巩固的后方，也是我党早期局部执政的有益探索。

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

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在谢子长等人领导下，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5年1月30日，红27军84师成立，形成了以瓦窑堡为中心，辖清涧、安塞、安定、靖边4个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国民党西北军阎更是对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如芒刺在背，一边推行保甲制，实行“并村”行动，在村镇建筑联防碉堡，严加防守；一边开始部署“围剿”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西北军阎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相继粉碎后，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对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加紧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5年2月，周家峪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经过数次反“围剿”斗争，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拥有30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区域武装斗争格局。红军主力部队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陕甘边根据地发展起来的陕北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



大青山革命英雄纪念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入选国家烈士纪念馆设施名录。纪念碑由台基、碑座、碑身、碑顶四部分组成，总高度20米，底座宽30米，碑面为大理石。曾经参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并在大青山战斗过的青海省委原第一书记杨植霖题写的“大青山英雄纪念碑”8个字，镶嵌在碑身正面宽1米、高10米的碑心石上，下方刻有“1938—1985”年份字样。碑座正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公元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电令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萧克等同志“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六月，又电示，“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应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之，惟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敌人知其重要意义，必多方破坏。故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需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八路军一二〇师遂派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率七一五团并师骑兵马一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八月，大青山支队与游击四支队、总动委会奉命由晋西北出发挺进大青山。越长城晓夜行，破封锁且战且进，夜过平绥路纵横横决。立马蜈蚣壠犹矢敌人。不久与杨植林（霖）、刘洪雄、贾力更、高凤英等同志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师，从此绥西绥中绥南绥东地区的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转战阴山七百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

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战争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李井泉同志在缅怀大青山的斗争时说：“武川是大青山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县内德胜沟、井儿沟、李齐沟、马场梁等地曾是游击队司令部及专属、县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驻地，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武川县各族人民参军参战，倾碧血书赤子爱母之心。拥军拥政，守焦土肩匹夫救国之任，送给养、传情报、抬担架、护伤员、挖窑洞、做军鞋……军民一家亲共筑血肉长城，风雨八载同书春秋新篇，其赫赫功劳玉铭山川，耿耿丹心彪炳史册。

大青山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大青山人民英雄伟业千秋！
先烈和英雄们的精神如巍巍青山永世常存

武川县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 勒

巍巍青山埋忠骨，塞北草原祭英灵。敬读碑文，深刻感悟革命先烈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翻身解放，不屈不挠、血染北疆大地创立的不朽功勋，不禁感慨万千，肃然起敬。

挺进大青山

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占领绥远，内蒙古西部地区沦陷。在绥远地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杨植霖、高凤英、刘洪雄等人团结蒙汉各族人民，组织抗日武装，在武器装备简陋的环境下，抵御日本侵略者。这支蒙汉抗日游击队，以大青山为依托，活跃于大青山南麓、平绥铁路沿线及绥远武川公路两侧。他们依靠蒙汉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开展武装斗争，很快由几十人发展为100多人的抗日武装组织，为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后，1938年8月，八路军一二〇师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姚喆等人的率领下，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及其下辖的游击四支队一道，由山西北上，挺进大青山地区。10月初，

青山作证

□ 孙杰

活跃在大青山地区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与大青山支队在绥中铺窑子胜利会师，蒙汉抗日游击队随之改称绥蒙游击大队，直接受八路军大青山支队领导。至此，中国共产党把抗日的红旗插到了大青山上，开启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艰苦历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民鱼水情

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后的抗日活动，极大地激发了绥远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许多蒙汉青年不怕牺牲，纷纷参军参战，大青山支队不断得到兵员补充。武川县青年郝秀山等十几人先后找到八路军参军。萨县游击队长王经雨的母亲乔培玲送儿子、孙子、孙女6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两个儿媳留在家中充当“情报员”。她的大儿子、女儿、孙女为抗日斗争献出了生命。为支持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绥远地区的蒙汉各族群众主动帮助八路军筹集物资，有的成为八路军采购员，有的加入运输队。在大青山支队由步兵改为骑兵的过程中，许多群众从自己的马群中挑选出最好的马匹，支持大青山骑兵支队建设。1941年冬天，大青山支队在转移途经敌占区岱海滩时，当地蒙汉群众看到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非常难过，只有几十户人口的小村很快就筹集到100多件棉被、棉衣，有些棉衣甚至还是刚从乡亲们身上脱下来的。

血洒敕勒川

大青山支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英勇斗争，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鲜血洒在塞外山川。中共绥南地委书记崔岩、张云峰，绥南专员程仲一，武川县县长李康，归源县县长原民等先后牺牲。绥察行署五连北上大青山途经归源县时，在山神庙沟遭到日军伏击，连长薛占海、指导员魏志中及13名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从1942年7月开始，日伪军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大青山支队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力部队从大青山撤往晋北，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军民常常陷入无米下锅、无房可住的境地，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姚喆带领战士挖野菜、剥树皮、摘野果充饥，由于缺乏营养，许多战士手、脚、脸浮肿，有的得了夜盲症。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始终坚持战斗在抗日斗争最前线。大青山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势力，牵制了敌人大批兵力，坚定了蒙汉各族群众抗日信心，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举国之力托起蘑菇云

□ 颜 慧

60年前的10月16日，随着西北大漠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它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铸就了核盾牌。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鲜明体现。新中国刚刚成立，新生政权就受到西方有核国家的多次核讹诈、核威胁。为打破核垄断、抵制核讹诈、应对核威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他讲：“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要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开始起步并向前发展。随着中苏两党关系出现分歧，苏共中央于1959年6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了牢记这个日子，党中央把原子弹工程代号定名“596”，决心要造出“争气弹”。1960年6月，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的全部经济合作项目协议，撤走全部援华专家。这年七八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会议确定了“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的发展方针。党中央不信邪、不怕压、勇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气魄，极大振奋了全体科技人员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来看，党中央重点突出尖端技术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很有胆识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改变新中国命运的“交响乐”，也是数十万

人合奏的辉煌乐曲。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机构，逐步形成大力协同、集智攻关进行“大科研”的局面。

理论设计是研制原子弹4个部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次，十几位饥肠辘辘的年轻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计算了一个月，结果却与苏联专家给的数据大相径庭。朱光亚、程开甲、彭桓武、郭永怀又和科研人员三班倒连续干了3个月，进行了3次计算，数据还是不对。一直到第8次、第9次计算，结果还是照旧！最后，周光召经过反复审核，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一锤定音：苏联的数据是错误的，中国人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九次计算”历时半年，终于摸清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规律。

理论设计的问题解决后，还有实验研究、生产制造和现场试验，这些都需要“千军万马”一起来鸣奏。为加强组织领导 and 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17日，党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会成立后，以力争1964年爆炸原子弹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区、1000多个单位组成强大的技术力量投入“争气弹”的攻关会战。

从1962年开始，西北荒漠的金银滩成为原子弹的“新家”，这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马兰基地，代号“221”。为了配合中央决策，世代居住在这的6000多名牧民，舍小家为大家，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条件，义无反顾地搬离故土。在中央专委的大力协同下，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以及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五大方面军”拧成一股绳，组成全国规模的协作网，先后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全国一盘棋”，汇聚集体的智慧是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重要经验。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系统工程。新中国进入“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人“急”，需要才“专”，但现实是“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为广纳天下英才，我们党实行“不管先后，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并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宣传，通过外交手段谈判协商，制定各种激励政策。

海外学子积极响应，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程开甲等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投入祖国的怀抱。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突然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但在原子弹研制队伍中出现了个叫王京的默默无闻的学术带头人。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王承书历经艰辛回国后，3次被问到能否开辟核聚变这一陌生领域、能否转行从事高浓缩铀研制、能否为国家核事业隐性埋名一辈子时，她都斩钉截铁地答道“我愿意”，并一生为之践行。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阐释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性埋名人”的家国情怀。张劲夫曾讲，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归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科技队伍。

党中央不仅在政策上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他们。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为解决科学家们生活上的困难，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进行讨论，统一考虑解决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多次表示，要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他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和海军等领导机关“募捐”，要求尽快拨一批副食品支援项目攻关的科技人员。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大大激发了人才的创新能力。苏联专家曾预言，没有外界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是，中国人凭借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和不知疲倦的大脑，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攻克了一个个世界难题。

邓稼先率领理论设计团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最原始的工具，含辛茹苦、通宵达旦，终于把原子弹的设计轮廓勾勒出来。点火中子源技术研究团队接受任务时，不仅没有仪器设备，甚至基本的实验室都没有。科研人员不等不靠，就地用沥青油毡作顶棚、芦苇杆抹灰当墙建成实验室就马不停蹄地开工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成功捕捉到实验变化的宝贵瞬间。

在研制原子弹这个长长的链条上，还有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在人迹罕至的金银滩，来自全军26个单位的5000余名指战员以3顶帐篷起家，进行“草原大会战”，很快，一个集科研、生产、生活为一体的核试验基地就在戈壁荒原上拔地而起。1999年，《纽约时报》曾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器发展？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